

追忆祖父冯亚佛

冯兰新 陈江帆

我的祖父亚佛公，字镇东，湖北省汉川县人，曾浮户石首。1876年（清光绪2年丙子）出生，1962年在武昌病逝，享年86岁。

辞家东渡

祖父亚佛公，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是位秀才，因受科举制度的束缚，至卒年亦无任何进展和造就。祖父又系一独生子。这样的家庭，虽比不得名门望族，但曾祖父决意要他多习诗书，力图早登科第，所以，祖父13载受业于塾师。当读至20开外时，也对自己发出了“为学苦无成”的叹息。因为，祖父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满清朝政腐败，外患频仍的时刻，其种种可悲的社会现实，在凡有热血的青年的眼前一幕幕地闪过。此时，祖父亲眼看到不少仁人志士作出了改变现实的尝试，如试图改变朝政的“百日维新”，义和团的反清反帝，对他亦大有启示。特别是1894年孙中山大胆上书李鸿章，同年创建兴中会，翌年又在广州举行起义，这些壮举对他的教育更大。他意识到拯救中国是有希望的，因而对孙文先生无比钦佩，从心底发出了“况兹国步艰，着鞭那可后”的呼吁，便私下许下只要一有机会就离家去寻找一条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愿望。这样，好不容易地挨到了1902年正当他26岁时，得

知清光绪旨意各省派留学生赴日学习“明治维新”的维新变法运动，决心努力争取赴日。一天，亚佛公趁曾祖父不在家，向曾祖母苦苦哀求出外深造。曾祖母哪能舍得独子远离呢，经再三求情说理，才打消家慈之虑，并加赞许，连连点头说好，“道是男儿志，安用长株守”。不久，湖北已推荐赴日学习的达十数人，亚佛公遂与同乡杨鸿藻、蒋东佛辞别家乡，负笈东去日本。祖父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乘船抵达了日本横滨。虽然安稳地渡过了太平洋，但眼前呈现的却是“岛屿纵横水一方”，身处异国的感情随之又有了变化。他站在富士山前回首一望，深深地怀念起故国故土，感到“神州西峙海茫茫”，将怎样把在日本的读书与改变中国的现状结合起来呢。脑海里开始浮起团团疑云。

亚佛公在日本入弘文学院，攻读社会学、政治学、法政概论及教育学等。学习期间，受到河上肇教授所传之《资本论》的影响，进而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是时，又有幸结识了在日本留学的黄克强先生，并一道投身到了留学生反清救国的洪流之中。随后借孙中山往返日本和在日本主办军事学校的机会，经黄克强介绍，拜识了比他年长11岁的孙先生。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组建同盟会，祖父毅然加入了此会。未及结业，就奉孙先生之令，开始亡命海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日本之间，宣传革命，组织与发展同盟会员。在南洋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一面教书，一面经营照相业，开办电影院，积极为孙中山、黄兴组织的多次国内武装起义筹募经费。后经陈衣涛（同盟会员）介绍给在婆罗洲的庄晓园，同田桐（即田太梓琴）一起就南洋、婆罗洲《中兴日报》编辑之职，藉以

报纸唤醒海外赤子共同反清救国。并与田桐等密切合作，在南、婆一带先后发展同盟会员40余人，组成四个小组，进行革命宣传、筹措款项，有力地奏起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尽管他做了这些工作，然而他觉得与那些起义抗清的勇士相比差之甚远。时有“年年空自悔蹉跎”，“望到乡关欲负戈”的想法和说法。1905年12月的一天，留日同学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朝留日学生之规定，竟在大森海湾投海而死。更使他悲愤难忘，写成了“佯狂负笈走神州，极目中原楚客愁。钟以能鸣真警世，人如猛省望回头。（陈氏有《警世钟》、《猛回头》两书）五更鼓角凄凉月，万里河山黯淡秋。国事已无天可问，伤心独蹈海东流”悼诗一首，以纪念烈士，鞭策自己，表示决心跟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求得共和，振兴华夏，作出不懈地努力。

祖父从1905年到1912年的夏天，一直在南洋、婆罗洲为革命筹募军械军饷。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和田桐日以继夜地通过《中兴日报》，向世界各地频频传送辛亥革命首义告捷，使旅居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纷纷庆祝，大享齐天之乐，

辛 亥 以 后

武昌义旗高举，宣告了满清封建帝制的崩溃。湖北最早成立了革命军政府，把清朝高级军官、汉族官僚黎元洪招来任了湖北的都督。我祖父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很快从南洋回国勦理鄂政，被委任为都督府秘书。不多时，而具有满腔热血以“天下为公”为指导思想，以谋求共和为己任的亚佛公，则耳濡目睹黎元洪之所作所为与孙

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离经背道。于是，愤起对黎举谏，……驱逐了满清馑虏，换来的应是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的革命气氛。而不应是新的民国官僚……，人民的呼号，听之任之，吾侪革命党人能不身省乎……。黎元洪虽不敢公开反对，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极不满意与他共事的革命党人。祖父见状就辞职不干了。接任秘书的杨玉如等，黎同样视之如敌，也只得辞职。不久，祖父由理财部派充府河税局经理，直到1913年，他不计个人得失与地位高低，为民国临时政府尽职尽责。

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职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竟辞职了。3月原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大权被篡夺。继而刺杀了宋教仁等许多革命人士，对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1913年孙中山开始讨袁，祖父六月交卸经理职，尽以所存30000余元，捐作讨袁经费，在经济上又支持了孙先生。9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被迫逃往日本。是时，祖父在武汉，也被袁世凯列入捕杀名单。他与蒋东佛闻讯后，随即穿着和服，趿着木屐，讲着日语，化装为日本人，从武昌渡江至汉口英租界，乘船转道上海，也流亡到了日本。

孙中山先生“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要做到“实欲竟辛亥之功”。孙先生看到辛亥革命后的同盟会已分裂瓦解，连黎元洪也入了会。1912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嗣后又决定解散国民党。1914年7月，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我祖父重新加入了此党。不久，奉孙先生之令，再次往南洋、婆罗洲改组同盟会，办理党务，扩大革命影响，共同再举讨袁旗帜。

1917年，孙中山被非常国会选为海陆军大元帅，我祖

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秘书职，侍中山左右。这是祖父从事革命后与孙先生直接共事的一段时间。此期，与宋庆龄、胡汉民亦是同事。

1918年，许崇智（早期同盟会员）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率粤军入闽，祖父被调到许的总司令部任秘书长。那时蒋介石是许的参谋长。他亲眼看到比他小10岁的蒋介石专横跋扈，常以参谋长的职权架空许。甚至叫许不要过问部中诸事。因而祖父决心不在许的总司令部继续留任，不与蒋介石勉强共事，毅然辞职回家。

1922年，祖父去上海，又受孙中山命令去闽运动军民响应援闽。攻克仙游县后，任该县临时县长。

我祖父亚佛公，在1905年拜识孙中山以来至1925年的二十年里，一直紧紧跟随孙先生。令人可惜的是孙先生还未能来得及全面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自指挥改组后的国民党怎样走上新的历程，却不幸于1925年早逝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祖父也失去了一位革命导师。

1926年，正当粤中护法军准备北伐的时刻，我的祖父仍满怀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大为乐观。他赠给邱伯衡旅长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短衣匹马粤东回，百战将军气不衰。半壁河山催鼓角，满腔忠愤郁风雷。鲁连岂许秦称帝，晋国犹夸楚有材。今日一杯黄菊酒，明朝重看岭头梅”。不久，祖父随北伐军回到了武汉，出任了江汉宣抚使田桐的参赞。

北伐前夕，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孙中山逝世后，揽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进而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飞黄腾达，步步高升。随

后又通过“整理党务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此时，我祖父如果能低点身价，巴结一下蒋介石，也许会得到高官厚禄。可是，祖父难忘孙先生的遗训，深知救国救民之志决不可失。许崇智等人也曾劝他对人处事要放灵活一点，但他很果断地说：

“饿肚子也决不向蒋低头。”1927年4月21日，蒋介石大叛变，完全背弃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大搞倒行逆施。祖父平生追求，到此彻底变成了失望。他眼看“空山虎走兔称王”，自觉“辜负同盟一念痴”，不禁感慨系之。

1928年春，早已宁汉合流的汪精卫政府，搜捕共产党人，杀害李汉俊，白色恐怖笼罩江城。祖父愤然抨击，引起当局不满。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竟然免除了祖父江汉宣抚使参赞职。1929年与吴醒汉、查光佛、熊秉坤、贾伯涛等一起被聘为湖北革命博物馆筹委会委员，实则是不让为政，堵塞言路。

在我7岁到10来岁的几年中，祖父每逢孙中山生日、逝世日都要携带家人，准备好一束自己辛勤种植的鲜花，乘坐租车，到中山陵去纪念孙先生（我在小学念书，先后只去过两次）。每次到中山陵，他总要绕着墓地走上几圈，以寄托自己的哀思，默诉自己内心的悲愤。同时为推翻满清，以身殉国的革命者表示痛惜。

弃政赋闲

1930年以后，我祖父基本上结束了政界生涯，就在南京闲住下来。家住南京菜市口，与老友李子宽（国民政府任职）紧壁相邻，住地原系旧皇城尚书府遗址，那时此地已与闹市相隔。祖父就在这里买地建起了住房和果园。并

将果园署名“证果园”（证果：佛教谓精修久之，悟道有得。亚佛公写有证果园诗草）。园有围墙，园门上书“挹清溪馆”，俨然隐士乐居之地，平日除与旧友来往外，就是博览群书，以种果树、花草自娱。居正（中央司法院长、同乡）、李子宽等老友看到我祖父终日闲着，多次来到我家劝说我祖父出任政府职务，也多点收入，使家境优裕一些。祖父虽与居、李私交甚笃，且平日唱和（此唱彼和，互相呼应。此处说做诗）颇多，理应听其劝告。终因所持政见不一，对再度从政一事，竟婉言谢绝了。祖母看到邻居李家门庭若市，进出乘坐轿车。自家呢，冷若刀霜，不见鞍马。觉得家境各异，生活差别天远，于是叹息不已，还经常埋怨祖父，说什么“骨头硬有什么好处，先走的赶不上后爬的，何必与人作对，自讨苦吃”等等。祖父听了只付之一笑。

祖父的一些朋友总是从关心我祖父的生活出发，都要他在自己的部门挂个名，以便拿点月薪，改善生活。1932年，李基鸿任安徽财政厅长，要祖父在蚌埠禁烟系统任职，以后在四川万县任禁烟督察主任。祖父当然认为禁烟是国之良策，他说，鸦片对中华民族为害巨烈。林公（林则徐）有言：若染之“十年无可筹之餉，十年无可募之兵”，所以不畏权势，不徇私情。1937年7月7日，抗战军兴，居正替祖父在司法院安排了一个湖广视察的职务。祖父每次视察归来，都把民情社况缮呈。然而有关民生、民权问题，亦使身居高位的司法院长权屈难伸。尽管祖父没有官衔，照顾的薪俸不多，而他对自己的处境总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他为许公武（考试院秘书长）题种菜的五言诗句里，也可领会到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己的

要求都是严谨的。题诗五首中三首是：“晨起荷锄出，凉露湿衣裳，年年尝世味，不及菜根香；一夜西风起，天地便成秋。吾民皆菜色，忍作肉食谋；功名何足贵，逸兴几人知。六朝卖菜庸，也来学为诗”。可见祖父身虽在野，而无奴颜，生活简朴，而不寒酸。今日回忆起来，令人肃然起敬。

华侨徐瑞林先生，也是我祖父在同盟会的好友，平日在生活上给我家很大帮助。徐知道我祖父喜爱读书，抗战前夕，他从上海赠给祖父许多书籍，其中有《四库全书》和《道藏》各一部。

《道藏》极为珍贵，祖父考虑到此书收来对后辈用途不大，决意转赠给南京茅山道观，当道观得知后，即派人下山到我家，并举行了隆重的恭迎仪式。由此亦可见祖父的眼光、胸怀以及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

1946年，我祖父70寿辰，在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工作的刘成禺以及居正等一些旧友为祖父写诗祝寿。刘以赋诗相赠：“僵翁心矩直，七十又争秋。一舸江南去，十年蜀道留。宴游亲短李，谈笑傲多刘。姜桂吾乡性，冯唐在故丘”。对我祖父大半生的为人作了评价。

浪迹石首

北国烽烟蔓延，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开始，日本大举进攻上海，继而南京告紧，危及武汉。是时，南京一片混乱。新的战时政府正在组织中，但军委会仍未撤消。平时政府也仍存在，但实际已空空如也。有些干员已经转到大本营，但大本营实际上和形式上都还未正式组成，组织十分松懈而且因循。尤其人人都晓得各单位将迅速撤往

重庆。人员及办公厅实际上已经开始疏散，有的到汉口，有的往湖南，也有些到广西，由于交通断绝或危险，故无法直达重庆，混乱的情形日甚一日，平时政府中部分被裁掉的人员也非常不满，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失业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祖父只得携眷向南转移，开始苦度流浪生涯。一路在安徽族人处和汉川老家作过短期逗留。12月下旬南京沦陷，在日寇不断向我中原进犯的时刻，我祖父亚佛公于1938年以一个普通难民的身份流浪到了石首。初到藕池，该地以其反清、倒蒋、退隐的一贯声誉，很受藕池天、沔、汉籍乡友们的尊重和欢迎。就是本地人对他也有异常的好感。茅草街有一位姓朱的先生能诗善书法，他听说有位姓冯的读书人到了藕池，以为是他在大革命时期结识的另一位姓冯的朋友，随即写诗并派人登门慰问和邀请。祖父乍见诗句，虽不甚明情况，但愿广交朋友，还是作了和句。称：朱先生闻余避难藕池，来书问讯并寄怀诗有咫尺天涯之感，次韵和之：“别离已久倍情浓，次复天涯咫尺中。沧海横流逢旧雨，光阴荏苒又秋风。蕉窗剪烛人都老，诗酒联床梦未通。三十四年一回首，是真是幻问长空。”和诗别饶风趣，不是旧友胜似世交。以后并走访了朱先生，从此答唱频频，交胜故知。

不久，茅草街的乡友亲朋，为祖父在街后做了一大间茅房，让他暂时定居下来，茅房座北向南，座落在街的东面。这里一片田野，凑巧的是宅旁东面不远处，有一条长沟，支起一道板桥，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住地空气新鲜，环境僻静，这天地早已生成的自然景色和新来造就的竹篱茅舍，相映生辉。所以祖父对住处十分满意。室内陈设简单，正是“数椽茅屋一床书”，真个“斯是陋

室”，祖父在这里栖身，乐趣亦甚多。平时除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外，再就是读书。他生活简朴，性格潇洒，平易近人。地方上的文人雅士、野老村夫都愿与他接触。或论诗文，或话桑麻，或谈起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提起抗日，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字里行间，都有仇恨日寇和内疚不安的语句。诸如：“国家应非垒卵危”，“眼见倭奴势猖獗，吾发欲指眦欲裂”（长诗），“无限国仇兼旅恨”，“国事艰危惭后死”等等，无不表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气质。

日寇南犯，渐渐逼近石首。祖父在司法院的月薪，因战乱邮寄困难而直接影响到全家的生活，迫使他只在茅草街住了两年之后，撇开眷属，只身奔往重庆的司法院。祖父在石首留居的时间虽短，但他对石首的山水人物却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尽管流浪的生活艰难，还是非常乐观的。一年的早秋，他到绣林走了一趟，游览了东南二岳的李靖祠，站在山上远望大江东流，大发思古之幽情，读了山中一些字迹不清的碑文，把足迹留在漫山遍野。两年当中，他写下了许多诗篇，有对自己劳动、住处、生活的描述，有对革命情谊的赞颂，有对日、蒋、汪的披露和痛斥，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怀情，还有对石首难别而吟出的骊歌。

日本投降后，祖父由重庆去湖南，又由湖南回到了武汉，战乱中的飘泊生涯虽告结束，但国家由战乱带来的“满地腥膻翻血浪，万家屋瓦葬蒿莱”的种种创伤，实在令他寒心。更难想象的是有一批人先发了国难财之后又发胜利财，他认为可鄙之极。使他更可恨的是蒋家王朝在抗战结束后不是力谋复兴，而是积极准备大打内战。再一次把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怕上裴公亭上望，故乡

风雨洞庭秋”，正是祖父心中又开始充满无限隐忧的写照。

欢 庆 解 放

1949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年头，终于在四亿五千万人民的渴望中来到了。中国共产党把光明和幸福洒向了人间，换了新天地。当时，我祖父亚佛公简直乐得象孩子似的唱“天亮了，解放了；解放了，天亮了”。又是赋诗，又是楹联，欣戴解放。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辛亥革命老人极为关怀，随即安排我祖父在省人委参事室任参事。他不仅能幸运地看到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能重怀满腔革命热情参与国家的改革和建设。所以，经常给我们讲“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亦更加艰巨”。“一是要珍惜胜利，一是要好好工作”。每在茶余饭后亦告诫我们：“在其位谋其政”，“为政以德”，“与民分忧，与民同乐”，“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等等。时过三十多年，遗训记忆犹新。

一年的早春2月，雨后天晴，春光明媚，百花含苞待放。省政协特邀赴东湖春游，大家雅集翠柳村。座谈会上谈笑风生。有的谈到对政府的感激之情，有的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祖父兴致极浓，随即口占七言二首：“名湖多以西为姓（苏东坡有“到处名湖尽姓西”句），独此名湖却姓东。湖上青山涵夜雨，村中翠柳织春风”；“平芜初试踏青鞋，柳眼才舒花半开。等到明年春烂漫，东君重简老人来”。以此寄希望于明年和未来。

解放以后，祖父的许多旧友、同僚，如：蒋介石、居

正、李子宽等都到了台湾，有的去美国，有的在东南亚各地。1956年，祖父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讲了话，追思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往事，殷切希望捐弃前嫌，一轨同风，长治久安，呼吁共同完成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

同年，经张难先先生的建议，在征得我祖父同意后，有关单位为增加武昌东湖风景区的色彩，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中书赠给祖父的横幅“博爱”取去，悬挂在行吟阁里，代为收藏保管，美化风景区。这横幅曾在我南京的家中挂过，战乱期间，它同大批藏书放置在安徽。抗战结束，从安徽运到武昌，又悬挂在武昌的家里的中堂左上方。横幅中间题“博爱”2字，落款右为亚佛先生雅正，左为孙文（印）。其字体端庄，笔划清细，可谓墨宝。

黄兴（黄克强，1874—1919）在病中留有遗书一纸，为李西屏先生（解放初省政协委员）收藏了几十年。解放前，李要求我祖父为收藏的遗书题字（黄、李均是祖父老友，李知我祖父善书法），祖父针对遗书写有“敬题西屏所藏黄克强遗书”两首七言绝句诗，其中有“千载精诚光日月，数行炳炳讨袁书”句，歌颂了黄兴对革命的忠诚和对讨袁的决心，并肯定了黄兴生前的功绩。“遗书”和“题诗”皆系珍品，从中亦可看出辛亥革命老人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这两件物品同“博爱”横幅在同一时间都献给了东湖行吟阁。遗憾的是珍贵文物均成了10年文革浩劫中的劫灰，而杳无下落。

解放后，祖父度过了10余年幸福的晚年生活。对祖父来说，虽处黄昏时，道是夕阳无限好。所以，祖父生前非

常感激党和政府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只可惜年过古稀，于国于民的贡献不大，好在他的儿孙后辈会继承老人的遗志，献身四化，补天功业靠后人。

郝文松整理

本文作者：冯兰新，女，随其祖父冯亚佛先后约20余年，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现已退休。

本文作者：陈江帆，南岳中学退休教师。系冯亚佛先生的孙婿。

武昌起义中的一位营管带

张善长整理

沈春岩是武昌起义中的一位营部管带，他1882年生于石首东乡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六、七岁入乡塾读四书五经，渐生了读书做官之念。1900年他18岁时，石首办起了高等小学堂，他考入此校，在学习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体操等新课中，他逐渐接受了新思想。毕业后，几次赴省考试失利，便对仕宦道途十分淡薄了。其时，正值中日战争和庚子赔款后，中国沦入了被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在坎坷的道路上跋涉的春岩，面对着内忧外患，转而潜心学习兵法，对中国古代或传入中国的西洋兵书，他都苦心研读，有人说他这是不走正道，他却反驳说：“人生当纵横欧亚，岂郁郁老死笔砚间耶？”1906年，春岩听说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欣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军”，在30标3营当士兵，他在军事训练中，吃苦耐劳，成绩优异，不久升为优等兵，历任伍长、什长、司务长、排长等职。并被选送到将校讲习所学习，专攻近代西洋各种兵法。

1910年，处在革命前夜的武昌，各种革命组织暗中活动频繁。入冬，沈春岩和徐达明从长沙到达武昌，先后在革命党人较多的振武学社和讲武堂学习。后又参加了“文学社”，和张庭辅、王文锦、王宪章、徐达明等，秘密演说，组织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讲武堂以剪掉辫

子表示同意参加革命的人超过了半数。讲武堂中大部是清庭军人，出现剪辮子的风潮，使清庭湖北总督瑞澂大惊失色。于是，他令军事参议官铁忠派心腹进行密探。一时，大街小巷有人跟踪无辮军人，使“文学社”的活动十分困难。

1911年8月，“文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庭辅在（起义门）住宅内邀同志蒋翌武、刘尧徵、蔡济民、王文锦、王宪章、徐达明、罗良骏、黄忠贵及沈春岩等秘密集会，商议起义之事，议定了在张庭辅住宅（今起义门）作起义指挥机关。沈春岩却不以为然，他力排众议地坚持说：“机关逼近，易于暴露，死不足惜，如大局何？”对沈春岩的深谋远虑，大家深表钦佩。再次讨论后，遂将起义机关改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

1911年10月9日，不料孙武（即孙尧卿）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失慎，机关暴露，秘密漏泄。一时，武汉风声鹤唳，是日下午8时许，彭楚藩到武昌小朝街85号总机关和蒋翌武等共筹举战，为清警所捕。至10月10日上午8时刘尧徵、杨宏胜坚贞不屈就义，许多革命同志被害。是时，王文锦仓惶至春岩处，并对他说：

“今晚举行起义！”并带了几枚炸弹给他。春岩非常高兴，和王文锦邀约同志去小朝街张庭辅处商议。由于即将举行起义，大家都很高兴，开怀畅饮，枕戈待旦。不料，就在汉口宝善里事发后，瑞亲徵自带兵搜捕。小朝街已在瑞徵的掌握之中，至深夜，清军扑向小朝街，包围了起义指挥机关。经与敌周旋，春岩等人脱险，张庭辅等不幸被捕。

小朝街起义机关被破坏后，武昌起义计划再次定为

10月10日。当日晚，工程兵第8营打响第一枪后，起义军的主力——30标中，虽然革命党人众多，但一些人临阵又有些胆怯，不敢率先行动。沈春岩便同正目彭纪麟高呼“站队”！“站队”！兵士们蜂拥下楼，赴军械房取了子弹，其它各队也相继响应。春岩督促队伍从营房后门冲出后，迳扑楚望台军械库。当时大雨滂沱，泥泞路滑，枪弹乱射，队伍混乱，春岩指挥若定，及时集合走散了的队伍，占领军械库，对保证起义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在军械库汇合后，春岩率部与炮队共同进攻瑞徵总督署。春岩英勇顽强，指挥所部终夜战斗，最后，攻下了督署，瑞徵逃亡，武昌起义成功。

11日晚，为预防清军外省援兵攻击武昌，春岩所部被调至洪山守卫。12日，被任命为营部管带，并奉令召集补充营1000余人。

10月24日，沙洋发生骚乱，春岩奉命去征讨，他安排一队120多人留省城保卫首府，令队长刘占胜坚守阵地，自己亲自率领第2、第3队300余人赴沙洋征战。当夜行至陈薄湾时，被敌偷袭，所属队长吴上达、彭胜发一时不知所措，春岩沉着应战，由敌后抄袭，歼灭了敌军，并生擒敌首3人。

11月中旬，清军大军压境，省城危急，春岩率部凯旋归来。其时，襄河炮艇，或助清军，或趁火打劫，沦为流匪。春岩沿途招抚炮舰20余只，水兵100多人。11月15日，袁世凯指挥清军猛攻汉阳。春岩率部协同10标和清军浴血奋战，伤亡甚多。11月27日，经10余昼夜苦战后，汉阳失守，起义军退守武昌。春岩奉命驻守武昌战略要地凤凰山。

12月1日，总司令部移驻洪山，军民惶恐，士气低落，守城士兵不过数百人。春岩积劳成疾，但仍带病昼夜巡视，使士气大振。总司令部根据情况，令春岩退守洪山。沈在复命中说：“凤凰山，全城关键，倘有疏虞，大事去矣。岩只知死守此山，与城俱亡，不知其他。侯大局底定，请治岩以抗命之罪。”是夜清军暗袭武昌，由汉阳南岸偷渡，已至河中，才被守兵发觉。但其时炮兵无人值班，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春岩当即立断，命本营步兵开炮，向黑影轰击，打沉敌舰数只，溺死清军不计其数，保住了武昌城。

1912年元月，南北议和成功。春岩奉命和蔡汉卿一道安抚荆宜，2月，因身染重病，回省城武昌治疗无效后病逝。

根据《武昌起义档案资料》改写

本文作者：市志办公室编辑。

